

從外交總長到修道院神父的陸徵祥

「讀人閱史」之一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 陸徵祥（上海圖書館提供）

他曾經是中國政壇和國際外交舞臺上的一位顯赫的人物，但到後來卻成了隻身隱居於異國的一名修士。他的前半生毀譽參半，他的後半生功德圓滿。他的人生起伏不可謂不大，他就是陸徵祥。

陸徵祥，字子欣，上海人。生於1871年（同治10年）6月12日。其父陸雲峰（誠安）為「誓反會」傳教員，每晨外出散發傳單，分送聖經。因之頗聞西洋之學，他不願獨子陸徵祥考科舉，於是在他13歲時，便送他進上海廣方言館，習外國語。讀了8年，又送他進同文館，專習法文。在進廣方言館之前，他只進過兩年私塾，讀完一部《四書》和半部《禮記》，因此他的國學根底並不深厚，加上

也沒有出洋留學獲得「洋博士」的頭銜。他的外交生涯完全得益於許景澄及楊儒等晚清外交家的言傳身教，是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鍛鍊成長起來的。

1890年（光緒16年）許景澄（文肅）任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他呈請總理衙門，調陸徵祥為隨員。於是陸徵祥於1892年搭輪船出國，抵俄京聖彼得堡後，初任學習員，旋升四等翻譯；再升三等翻譯，加布政司理問銜，即選縣丞，後升二等翻譯。此後4年陸徵祥一直於許景澄門下「學習外交禮儀，聯絡外交使團，講求公法，研究條約」；許景澄也著意栽培，不僅培養訓練其作為一名外交官的基本技能素質，更注意對其道德人格憂國憂民情懷的陶鑄。馬關之辱後，他曾告誡陸徵祥「你總不可忘記馬關，你日後要恢復失地，洗盡國恥」。許景澄對陸徵祥的影響是深遠的，他總是以許景澄為槓範，亦步亦趨，甚至忘記其本鄉上海話而隨許景澄講嘉興話，因此駐俄使館同仁，稱為「小許」。若干年後，陸徵祥仍然深情地提到「我一生能有今日，都是靠著一位賢良的老師」，對許景澄的感恩之情，溢於言表。

1896年冬，許景澄調職，繼任駐俄、奧、荷公使為楊儒，他奏留陸徵祥，加同知銜，即選



知縣；又奏加直隸州知州銜。1902年，胡惟德繼任駐俄公使，亦奏留陸徵祥，加參贊銜，又奏加三品銜，即選知府，旋升二等參贊。1906年，清廷升任陸徵祥為駐荷公使，離俄去海牙，首設中國使館。當陸徵祥離俄之際，俄皇尼古拉二世破格召見，且派馬車迎送。接見時，俄皇親手贈授勳章，而且俄后也出見，禮遇之隆，實屬罕見。1911年，陸徵祥由海牙赴聖彼得堡，為改訂陸地通商條約專使。抵俄京後，駐俄欽使適被調回北京，陸徵祥遂被任為駐俄公使。

不久，武昌起義，清室遜位。袁世凱任臨時總統，唐紹儀任內閣總理。陸徵祥也於1212年5月，回國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從此，他由駐外使節進而掌握外交之樞機。他歷任趙秉均內閣之外交總長、熊希齡內閣之外交總長。袁世凱稱帝時，他以國務卿兼外交總長。1917年，任王士珍內閣之外交總長。1918年，又任段祺瑞內閣之外交總長，錢能訓內閣之外交總長。1919年，他以外長任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會。1920年，辭外長職，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

陸徵祥在外交總長任內的兩件重大事件，一是簽字於日本所提出之「二十一條」；一為拒絕簽字於巴黎和會。這「簽字」與「拒絕簽字」兩件事情，都造成極大的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強行派兵接收德國（同盟國）在山東膠州灣的租界地，以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帶，中國政府無力阻止。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不顧外交禮儀（條約當經由外交部），由駐華公使日置益直接向中國元首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包括：（1）關於山東省四項；（2）關於南滿州及東部內蒙古七項；（3）關於漢冶萍公司二項；（4）關於不割讓沿海事項一；（5）其他希望條件7項。逼迫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接近等同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日置益公使在將文本交給袁世凱之前，警告袁要絕對保密，若透露出去，將產生嚴重後果。在談話中，公使提到革命黨人「與許多在野的日本人關係密切」，「日本人無法制止這種人在中國興風作浪，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好的證明」。並表示大多數日本人「認為大總統是堅決反日的，大總統的政府與遠方國家親近而與鄰國為敵。如果大總統接受這些條件，日本人民就會相信大總統對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時也將有可能向大總統提供援助。」日本對袁世凱可說是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同時進行。

而當時陸徵祥實已退居總統府外交最高顧問，身當其衝者原為外交總長孫寶琦與次長曹汝霖。然因孫寶琦在日置益公使面遞條約時，即大發議論，袁世凱斥為荒唐粗率，不足當此重任，乃「臨陣換將」，發表陸徵祥接任外長。當中日雙方在外交大樓開議時，陸徵祥頗能以堅忍之精神、迂迴之戰略，逐條辯護，據理力爭。自2月2日正式開始談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止，歷時84天，正式會議25次，會外折衝不下20餘次。4月底，談判完全陷入僵局，

日本再次調動軍隊，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

袁世凱缺乏談判籌碼，只能一面拖延，一面讓其秘書顧維鈞將條款內容對外披露，希望獲得國際輿論支持，以抵抗日方壓力。但當時歐戰正酣，友邦亦無法分心東顧，國際援助無望，內審國勢，又無力捍衛主權，於是只得委曲求全。至5月9日，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脅迫之下，袁世凱及北洋政府乃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大部分條款，史稱「五九國恥」。

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徵祥即坦言「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三五年後，一輩青年不明今日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果如其然哉？否也。其一：陸徵祥在談判中完全稟承袁世凱的旨意，在袁世凱設定的框架內對日進行談判並最終簽字，他的職業要求他必須服從國家政策政府意志，糟糕的結果使成爲歷史無辜的犧牲者。其二：將二十一條最終之結果與日本原提案比，經過艱苦的談判，還是維護爭取了很大的權益的。第5號駁回，第4號也以「商人之產業，政府不能預定」加以駁回。其三：簽字後，陸徵祥以其豐富的歷史及外交閱歷，提出「參戰」及「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的補救建議。

學者陳恭祿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而當時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在日記中寫道：「吾因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名報人王芸生也評價說：「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可說持平之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因緊隨美國加入協約國參戰而成爲戰勝國，並應邀參加巴黎和會。1919年1月18日，舉世矚目的巴黎和會在法國凡爾賽宮隆重開幕。當時中國代表團成員有5個全權代表，其中有擔任團長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但作爲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和會上反而成爲被宰割的對象，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的主權，但英、法、意主張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美國提出暫交英、法、意、美、日五國共管，遭到日本拒絕。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兩項提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的權益。但提案被否決了。因爲1917年參戰命令公佈後，段祺瑞即與日本有西原大借款，又訂軍事同盟，且在山東問題之換文中，對於膠濟鐵路之日本提議，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於答文內，竟寫有「欣然同意」一語，以致中國代表團在巴黎手腳被縛，當時顧維鈞在和會宣稱：「1915年之約（二十一條），爲日本哀的美敦書所迫而成，當時爲保全東亞和平，不能不稍隱忍。1918年者（山東問題中日換文），亦即根據前約而來。」似亦氣壯詞嚴，卻經不起美總統威爾遜的



一駁。美總統指出：「1918年9月，歐戰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顧氏雖仍有所答覆，但於「欣然同意」則無法加以解釋。以故，我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之失敗，雖有多種因素，而「欣然同意」一詞，鑄成大錯，亦為重要原因之一。

巴黎和會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極大地震怒了中國人民，也打破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幻想。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吹響了反帝愛國的戰鬥號角，「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的吼聲傳遍全國，爆發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毆傷時適歸國之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直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為賣國賊，要求政府予以罷免。

面對對德和約應否簽字，一度困擾著陸徵祥等代表團成員。如果簽字，山東恐無收回之日；若不簽字，又擔心會得罪列強，更擔心因此而不能加入國際聯盟。因此陸徵祥去電北京請示，應否簽字。他建議政府：「隱忍簽字，而將山東條款保留。」亦即是在和約內註明中國對山東問題條款不予承認的保留意見，中國才能簽字。無奈國內此時為學潮所困，總統、總理紛請辭職，幾於中樞無主。5月23日，北京政府發來「經熟思審處，第一步應力主保留，以俟後圖。如果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5月28日，中國代表團召開秘密會議，針對簽字問題：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主張不保留絕不簽字；胡惟德、王廣圻同意簽約。陸徵祥於當天再電北京「請求」政府「立速電示」。6月13日，錢能訓內閣垮臺，總統徐世昌任命財政總長龔心湛代理國務總理，組織看守內閣。又「電飭巴黎各委員，對於和約簽字問題，令其審度情形自酌辦理。」把球又踢回給陸徵祥。顧維鈞回憶說：「這自然把中國代表團團長置於極為嚴峻的困境。」

學者黃尊嚴指出，與陸徵祥畏首畏尾的心態及「保留簽字」方案遭到內外阻力後的一籌莫展有所不同，顧維鈞態度鮮明地力主拒簽，並採取了極富靈活性的談判策略。那就是：向和會不斷地提出各種最低條件的保留方案，「在力爭保留完全失敗之後拒絕簽字」，以「得到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因此他認為顧維鈞才是此次拒簽和約的頭號功臣。顧維鈞在回憶錄中說：「儘管國內輿論明確無疑，使人確信中國理應拒簽，但北京政府和巴黎的陸總長依然感到採取這一步驟責任實在重大，後果難以預料。陸總長本人起初贊同簽約，甚至即使不允保留，可能也會贊同簽字，但由於中國國內以及巴黎形勢的發展，在國內輿論強大壓力下，他最後也同意我的意見，反對簽字了。我至今難以推斷，如果北京最後的訓令是簽字，他是否會俯首遵命。」事實表明，一直猶豫不決的陸徵祥之所以最終同意拒簽，是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聽從顧維鈞意見的結果。

1919年6月28日，和約在巴黎凡爾賽宮中明鏡殿簽字，各國代表均已蒞齊，中國代表卻缺席

不到，一面以抗命拒簽，電請政府交付懲戒。詎至7月10日，外交部忽正式發表不簽字命令，陸徵祥一行，遂由原先的抗命轉為符合命令。於是當中國代表團從巴黎回國時，船到吳淞口，便受熱烈歡迎，岸上立有幾千人，高擎大書「歡迎不簽字代表」的旗子，臨風招展，盛極一時。

這次外交的失敗將陸徵祥所有的夢想摧毀。隨後，他決定退出外交圈，攜愛妻遠渡比利時。陸徵祥的妻子培德·博斐（Berthe Bovy）是比利時人。其祖其父均為比國將軍，與當時比國駐俄公使洛凱Loghait係至戚，培德隨洛凱常住俄京，且常出席各項應酬交際之場合，陸徵祥以善於應酬故，熟知外國交際之禮法，故中國公使必由陸徵祥同去任翻譯，而該時俄皇宮廷中，以陸徵祥風流瀟灑、年少英俊、談吐溫文，都有好感，因此外人皆樂與交接。陸徵祥與培德一見傾心，遂諧燕好。於1899年2月12日結婚於俄京。

陸徵祥任外交總長時，初入內閣，未便攜妻同來。他說：「我掌外交後，先幾個月，未帶內人同來，因我結婚時，許多人反對，許景澄、楊儒兩欽使都不贊成。袁項城（案：袁世凱）一次問我說：『陸夫人為什麼不出門，連拜總統夫人都不來。』我說：『內人現在已經完全中國化，像中國女子不愛出門。』項城含笑說：『這好極了，今晚總統府宴請英國公使，為他餞行，便請陸夫人來陪英國公使夫人。』我說：『內人一定來。』這是我的內人第一次到來中國赴宴會應酬。後來，項城任命我內人為總統府禮官處『女禮官長』，各國公使夫人，都很滿意。也是中國政府第一位女禮官長。」

在巴黎和會行前陸徵祥向培德夫人表示，要在和會上力爭廢除日本二十一條並收回日本強佔山東的主權。但是巴黎和會是列強的「分贓會」，當然是拒絕中國的要求。此際陸徵祥竟對培德夫人的承諾「置諸腦後」，準備在和會上簽字。然而就在簽字當天，巴黎華僑和留學生將中國代表住處團團包圍，阻止陸徵祥代表去簽字，陸因無法走出去，因此最終未在和會上簽字。回國時，陸徵祥受到愛國英雄式的盛大歡迎。後來培德夫人得悉丈夫未能簽字的「真實原委」，心中有一種被丈夫欺騙愚弄的痛楚，她決定離開中國和丈夫，回法國後在巴黎養病，臨終時給陸徵祥寫了一封遺書：「子欣，我的病大概沒有希望了，親愛的，你平生一切都對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認為最不光彩（指簽訂「二十一條」一事）；你這件事，不僅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的國家，並且對不起上帝。我死了之後，你最好趕快到比國從前我學習的教堂裏去服務，也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還可望到天國去。子欣，永別了！」。

陸徵祥趕到巴黎，未能和妻子見最後一面；看到遺書後痛哭，絕食三日。他遵照妻子遺言，1927年10月4日，陸徵祥在比利時布魯日的聖安德魯修道院正式出家，成為了一名修道士，皈依基督教，從此不問政治。很多人對這位年近六十的人還來當普通修士感到不解。陸徵祥說：「說實話，我並沒有追求什麼，也沒有求光明，也沒有求幸福，我僅僅勉力盡我之職。…



…我一生僅在這時，追求了一件東西，我求一退省時機。我開始祈禱，我有意尋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宅中。我尋路時，緊緊記著許文肅公的遺教：『當靠自己，勿靠旁人。』同時也記著先父『靠天』的遺訓。我那時既無父、又無師、又無妻。我只有一心靠天主，一心靠自己。仁慈的天主引我前進，我進了修會的生活中。」

這時候的陸徵祥生活貧苦。有一次，國民政府駐日內瓦國聯代表顏惠慶專程去拜訪這位老上司，但一見之下卻大吃一驚，原來，陸徵祥一臉營養不良的樣子，簡直和街上窮困潦倒的老人沒有區別。顏惠慶馬上拿出錢送給陸徵祥，但被婉言相拒，陸徵祥稱自己立誓安貧從教，如收錢也將交給院長。

成為修道士後，陸徵祥一直在為簽署「二十一條」之舉而懺悔，在他1937年給好友劉符誠的信，就說：「……以自身的經歷，此筆貽誤國事之大帳，早晚總要清算。貽誤國事，前清老臣既不能辭其咎，民國要人復不克卸其責，全國民眾終不能完全委諸領袖人物之肩背上，而不自認其貪懶自棄之一部分的責任。值此清算總帳之日，尚有不覺悟之輩，背國助敵，為虎作倀者，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小兄於此筆大帳上欠負不輕，於前清帳上、民國帳上、國民份子帳上，都有重大的欠缺。既承竹筴先師之訓練指導，復許先室以殘身獻事上主，借以作補贖工夫，減輕我一身對世界、對祖國、對民眾之罪惡帳目，迄今思之，實出上主寵召之恩。小兄目高時艱，更感主恩於無窮期矣！惟此筆血帳何日算清結束，尚難逆料，惟主命是聽耳。」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陸徵祥雖已遠離國內戰場，但他並未置身事外，他以基督徒的身份，積極向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1939年初，南京主教于斌到比利時拜訪他，商議由他主編《益世報海外通訊》，介紹中國抗戰的情況，呼籲歐洲各國人民支援中國的抗戰。他在以「木蘭」為筆名的文章中寫道：「我們中國正在為捍衛世界的文明而戰……為了那些慘死於日軍屠刀下的無辜中國百姓，請別買日本商品，因為你們所付出的這些錢很快會被日本人變成槍炮來殺戮中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

1945年8月，兩名專程從中國國內趕到比利時的名記者陸鏗和毛樹清採訪了陸徵祥。他們看到一位頭上有兩條受戒的線、鬚髮略現斑白，扁嘴，彎腰，年已73歲的老人，金絲眼鏡，全身黑色道服迎了出來的陸徵祥。他一方面對於曾替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向中國人表示懺悔，他不無感慨地說：「三十年來我一直為此深深負咎，因此，從不願和人提起這件事。即使被問到，我也禮貌地拒絕回答。二位先生不遠萬里而來探候，無以為報，乃簡述往事。總歸一句話，弱國無外交。」另一方面他又對中國取得抗戰的勝利異常興奮，感慨終於「在有生之年得見國家一雪前恥」。陸鏗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陸徵祥談到過往17年的修道生活，很興奮，他說：「我是一個錢沒有，而在這裡舒適地生活了十七年。修道院裡，不但有裁縫、木匠，而且

五畜俱全。最初進院時，還有些小工廠。我越過越健康。做官37年，最後兩袖清風。二十一條簽訂後，本來曾以外交總長立場，建議袁世凱准設養老金制度。不久袁世凱下臺，建議也落空了。」陸鏗說老人幽默地告訴他們說：「幸虧找到這條路，否則恐怕早餓死了！」。

1949年1月初，陸徵祥走到了自己的生命盡頭，此時他仍然掛念著戰亂中的祖國，當修道院長到醫院看望他時，病危的陸徵祥用力說出了「整個地為中國，整個地！整個地！」。1月15日，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一位「修道士總理」病逝，終年78歲。

據《中國時報》駐倫敦特派員江靜玲2006年的採訪報導說，陸徵祥在聖安德魯修道院裡待了22年，始終謹守會規，辭世後簡單的與其他修士合葬一處。當年曾經跟隨過他的年輕修士們，如今都已是八旬老人了。在修道院圖書館侍奉的巴克特神父回憶，陸徵祥是個平和慈祥的長者，由於「陸」與當地語言「狼」諧音，所以他們管稱陸徵祥「老狼」。修道院裡有一個存放陸徵祥照片資料的小房間。巴克特神父指著其中陸徵祥穿著修士服的一張照片說，「他真的是從基層修煉起，看，他的修士服前襟只有那麼短。」巴克特神父表示，修士服的前襟愈長愈表資深。小房間書桌一角，壓了一張巴黎和會座次表。詢問後來在比屬剛果服侍三十年的巴克特神父，是否知道「老狼」入修院前的事蹟，巴克特神父想了一下說，「一個非常特別的中國人，不會再有這樣的人和例子了。」

延伸閱讀

- 羅光（1967）。陸徵祥傳。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黃正銘（1970）。巴黎和會簡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